仰、社会习俗等不同情况，因时因地制宜，建立行政建制、颁布有关法令，完善统治制度等一系列治边措施，而这些治边措施的成败得失，直接关系到边疆开发的进程，故清政府的治边措施应作为开发史的重要侧面加以研究。

在清政府实行治边政策的同时，为解决当地军民经济生活的需要，必然要采取一系列开发措施，因而便出现了以垦殖土地为主要开发形式的各种屯田。垦地的扩展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而农业经济的发展又促进原有牧业经济、渔猎经济，并带动手工业生产、商业贸易、城镇建设、交通开发、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因此，在清代边疆开发史研究中，边疆地区的农牧业发展状况、土地开垦程度、水利设施、生产技术、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城镇建设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应作为研究者探讨的范围。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我国边疆地区割占领土、经济掠夺，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破坏了领土的完整，造成边疆瓜分的险恶形势。但随着帝国主义对边疆的入侵，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思想意识也传播到边疆地区，因而在客观上刺激并促进了近代工矿业与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这些的历史事物，也应视为边疆开发史研究的对象。

可以看出，清代边疆开发史是一项内容复杂而又涉及诸多学术领域的研究课题，要全面、科学地揭示出它的历史过程，今后还需要作出更大努力。我们相信，在史学界同志共同奋力耕耘下，在清代边疆开发史这块学术园地里，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来。

边疆研究要注意利用外国文献资料

刘存宽

中国边疆史地是一门综合性学问，它涉及到许多学科，涉及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可以说是众学交叉辐集的十字路口，名副其实的边缘学科。这项研究工作难度很大，需要研究者具有多方面的训练和素养。清代是中国疆域基本确立、随之出现全面边疆危机的朝代，清代边疆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天地广阔，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清代边疆研究，前人积累了大量资料，有不少研究成果，近年我国学术界又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在蒐集、整理、翻译、利用外国文献资料方面，似乎仍有所欠缺。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中文文献资料无疑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忽视外国有关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利用了。为什么边疆研究中要注意利用外文资料呢？首先，中国是一个大国，海疆陆疆共有十几个邻邦。这些邻邦历史上和中国，尤其是中国的边疆地区长期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对我国边界的变迁及边疆地区的发展和命运影响甚大。如果我们不了解邻邦及毗邻我国的地区的事态发展，我国边疆发生的许多事情往往得不到正确的解释。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列强对中国的种种侵略，边疆地区皆首当其冲。与此同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向全世界的扩展，地球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情，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边疆更加受到国际上诸种因素的影响。而外国有关中国边疆地区的记载，更是汗牛充栋，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边疆问题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次，自十七世纪西方

早期耶苏会传教士来华迄今，外国对考察和研究中国的边疆地区一直发生极大的兴趣。中国边疆地区长期是国际中国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除去大量专著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旅行记和地理考察报告等。这些人研究和考察中国边疆的动机各不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然而其中有一些研究成果，学术价值较高，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旅行记和地理考察报告的作者们，以亲身的经历详细论述了我国广大边疆从自然地理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宗教、边界、风俗习惯等情况，内容的丰富往往超过中国的文献记载，研究中国边疆的人不可不读。最后还要着重指出，虽然中文文献资料一般来说对研究中国边疆有头等的重要性，但是有时也不尽然：除了中文历史文献记载较之西方一般偏略外，还有涉及某些事件的中文文献已经散失，以及有关某些事件的关键性文献恰好是外文而不是中文等因素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献资料就是决定性的了。如关于1898年英国强租香港新界的资料，遍查国内档案和书籍，所获甚微，不能据以窥其全豹，而英国外交部和殖民部的档案中，则保存有关此事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其中包括港英当局和英国驻华公使与英国殖民部、外交部的来往函电，以及英国公使与总理衙门交涉的记录簿原件等。当时清政府致英国的历次照会，在中文档案中找不到，英国档案中却能查到它们的英文译件。又如研究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哥萨克入侵黑龙江的历史，靠中文记载是根本不可能的，查来查去不过那么几句话，但俄文《历史文献》、《历史文献补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文件和资料）》等书中，对此有详细记载。类似的例子还不少。从事中国边疆、尤其是清代边疆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想必和我有同感的。

我这里如此论证边疆研究中外国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并不是要提出什么新问题，毋宁说，这仅仅是重新提出由于科学文化落后和长期封闭留给我们的一个老问题。所以要旧调重弹，是因为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我本人对此有切身的体会。在从事中俄关系史和香港史研究以及前往英、法、苏等国和香港搜访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许多对研究中国边疆十分重要的外文档案、资料和著作，许多材料国内并不知道，更谈不上利用了。例如研究中印、中缅边界问题必须利用英国国家档案局和印度事务部档案馆的有关档案（印度已故古普塔教授就是利用印度事务部的档案，对中印边界问题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研究中越边界问题必须利用法国外交部档案馆和设在艾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法国国家档案馆海外存档处的档案等。当然，近年我国一些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外文文献资料的搜集、翻译和利用，可惜这种努力多半是分散的，支离破碎的，有时甚至是重复劳动的，缺乏有关方面的支持和全面统一的规划。目前限于人力物力，在这方面尚不可能有大的举动，但是如果能够重视起来，有所计划，循序做去，积以时日，成绩必然可观。